

重庆移民史

李禹阶◎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庆移民史

主编◎李禹阶
副主编◎向中银 岳精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移民史 / 李禹阶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161 - 3193 - 0

I. ①重… II. ①李… III. ①移民—历史—重庆市 IV. ①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546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55.5
插页 2
字数 912 千字
定价 1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人类历史上，人口流动与迁移往往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在中国亦是如此。在华夏大地上，自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就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举族迁徙。这些人口流动和迁徙虽然往往是因为灾害、战争、边屯、获取耕地、政府政策性迁移等政治、经济、社会原因所促成，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个地理空间内所存在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差异，各行政区域间所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发展程度的差异，使各地区人口流动和迁徙的规模、频率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及其特点。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既是一部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也是一部东西南北人口流动与迁移，导致不同地区人与文化互融互化的历史。在先秦时期，由于外在生态环境、人口、民族等压力与国家内在的阶级间剧烈冲突相互作用，导致社会矛盾的激烈化和国家社会政治机制一体化，由此构成夏国家的演进与夏民族融合的互动之路。从文献考察，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中原大地，既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说：“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又是一个部落与部落冲突十分激烈的时期。“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①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② 酷虐的自然条件以及部落间无序的争战严重威胁着当时人类的生存，并由此产生出以尧、舜、禹部落

① 吕不韦：《吕氏春秋》卷2《荡兵》，《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48页。

② 贾谊：《新书》卷2《制不定》，《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6页。

为主体的、东南西北各部族“自愿联合”的庞大的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的主要职能就是对肆虐自然和无序争战的一种应力机制：即以各氏族部落相互凝聚的共同力量，来抗拒单个氏族、部落所无法抵御的洪水、干旱；通过联盟内社会整合，达到同一地域部落集团的有序化，平息内部争战或抵御其他部落入侵。《尚书》所记“四岳”、“百姓”，当是指这一共同体内的众多成员；他们所讨论的治理水害、驱逐三苗等，当是其时由形势所决定的两大主题。而在这种内聚型的各部落间的融合过程中，社会整合所必需的权力基础也出现了。同时，民族的大规模迁徙、融合，以及相应而来的社会整合也同步出现。文献学和考古学材料表明，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各血缘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在进行军事殖民性质的大迁徙中，在中原黄河各支流水系阶地、平原上展开激烈的土地争夺战并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融合。徐旭生先生在谈到炎、黄族团在黄河流域的迁徙时认为，黄帝族团“从陕北发展向燕山地区，其迁徙路线大约是顺北洛水南下，至今大荔、朝邑或临潼一带渡河，沿中条山及太行山边逐渐东北上”。^①而起源于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的炎帝族团，与黄帝族团夹着黄河南北两岸各自向东，进行军事殖民式的迁徙。黄炎部族的东渐，东夷族的西向扩张，苗蛮部落的北上，使中原成为各氏族、部落血缘融合的旋涡。在现今的中原地区，各氏族群体你进我退，你入我出，战胜的氏族群体在这里定居下来，形成华夏族的原胚。战败氏族集群或退居当时生存环境极不便利的江淮、西南，或远走高飞，向遥远的西部、北部逐步迁徙。《尚书》中《尧典》、《舜典》称尧、舜、禹时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分北三苗”“黜陟幽明”。所谓流、放、窜、殛、分、黜陟，实际上是通过暴力方式处置战败部落，也是当时战败氏族集群的境况的写照。现在尚存的传说的帝王系统中混淆不清的数十个“帝”“王”，当是在中原大战中曾一度处于优势的各血缘氏族、部落群体的首领。因此，应该说，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口流动、迁徙就成为民族融合和发展的基本要素。

在中国古人眼中，夏国家与夏民族共同体同时产生。同时，这种政治与民族之间的互生耦合，是在人口、民族的迁徙与移动中实现的。目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前考古中发现许多古城、古国、古文明，以及标志等级关系和族属关系的礼器、符号，可以认为是完成这一转化的物质与精神的中介。例如夏王朝的建立，古人通常认为是与大禹“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置万国”有着重要关系的。《齐侯钟铭》称：“奄有九州，处禹之堵。”^①《叔夷钟铭》说：“咸有九州，处禹之堵。”^②《诗·商诵·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诗·商诵·殷武》有“设都于禹之绩”，说明在古人眼里，大禹治水与地域性国家和民族有直接关系。而这个关系建立的过程，就是部族的流动、迁徙与民族的融合过程。《尚书·禹贡》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其中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由此而达到“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禹锡玄圭，告厥成功”。^③孔氏传曰：“四海之内会同京师，九州同风，万国同贯，水火金木土谷甚修治……”孔颖达疏：“正义曰：昔尧遭洪水，道路阻绝，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叙今九州所共同矣。”^④孔氏传、疏虽有后人臆想之弊，但其所反映的自大禹后九州同风、万国同贯的思想，却与《诗经》、《左传》、《国语》等记载大致同一，说明它至少有着西周春秋时人口碑相传的依据。事实上，《禹贡》大九州思想本身即反映战国时人对历史和民族的一种理解，即夏禹时代既是贡赋倡兴，“爵有德，封有功”的国家初兴时代；又是以夏为主体的民族大迁徙、大会同的融合时代。在大禹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时候，史前的早期国家认同和初始的民族融合与认同也达到高潮。如“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一方面有其时大小邦向禹称臣的“天下咸朝”的政治国家认同之意；另一方面也包含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小族氏自愿认同于夏族，“四海会同”之意。自夏之后，许多在夏初尚能见到的族（国）名、部落名几乎消失，说明这些散居在四面八方的部族（邦国）已消融在夏民族与国家中。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春秋时代的剧变及其

①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9，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2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8页。

③ 《尚书正义》卷6《禹贡》，《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152页。

④ 《尚书正义》卷6《禹贡》，第152页。

历史演进本质上对华夏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方向起了定位作用。一是华夏民族文化圈进一步向四边疆域扩展，越来越多的夷狄之地被纳入华夏文化范围，许多过去的夷狄之民融合于华夏文化中，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分子；二是许多诸侯小国也在战争中被大国兼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也随之加快。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战争，使远在中原外缘的西部、南方边陲，在传统上被华夏人视为戎、蛮的秦、楚等国，也通过政治统一战争，进入了华夏民族与政治国家的行列。这种以统一天下为使命的争霸战，虽然是以军事的血腥手段，但是，通过由诸侯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且直接推动了华夏民族一体化的融合进程。秦、齐、楚、燕东西南北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互渗的历史潮流，在政治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中，成为其时的主流。它的结果，除了建立了华夏政治大一统国家外，也空前加快了华夏民族一体化的融合进程，华夏民族的界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民族的界限向四周大大推移。秦统一中国，帝国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①其中虽然不乏夸耀之词，但是华夏的民族界限与范围，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政治的一统与民族的不断融合，始终是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的。

秦汉以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移动仍然在不断进行。在两晋南北朝时，由于北方地区渐趋寒冷，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汉族士人大规模南迁，“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②，形成了著名的“永嘉南迁”的中国人口南迁高潮；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中原人口大量南移，以至于“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③，形成汉人南下的又一次高潮。

明清时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由东向西的移民高潮。当时全国人口分布的梯度仍然很大。人口分布密度呈现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的逐步由大到小、由密集到稀疏的趋势^④。这就使中国人口分布出现东西南北，尤其是东西部之间不平衡的情况，也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移民规定了

①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② 《晋书》卷65《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6页。

③ 《李太白文集》卷25《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四库全书本。

④ 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大致的方向。于是，由平原向山区的人口迁徙，由中原腹地和长江流域、东南地区向西部地区的移民，或者由关内向关外的人口迁徙就成为移民的主流。大批人口从东到西的迁徙，从内地到边疆的流动就成为主要趋势，也加快了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人口流动不仅加快了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形成了颇有特点的移民文化，直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也形成了民族的文化特征。应当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吸纳东西南北各个地区的先进民族文化特色而共融的多元的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在承认华夏基本价值观念的尺度下，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明成果，在民族和地区间的人口迁徙与流动中，逐步渗透、交融于华夏文明之中，并形成一个动态的交融互化的发展历程。这种互动历程，使汉晋、唐宋，乃至元明清等王朝，来自东西南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例如西域的音乐、舞蹈、瓜果、技艺等）不断传入中原大地，与华夏文化融合，形成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化、互融，从而影响着华夏文明的进程。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华夏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早已不限于其生成时期的文化范围，而是一个在民族与地区的人口交往、迁徙、融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的，互动、互化的，交融并进的，融合东亚大陆各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的产物。

在近当代，人口迁移已经成为世界普遍的情况，移民文化也成为现今人们十分关注的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在现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诸多领域，对于移民及移民文化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前沿的课题。尤其是区域性的移民历史，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正在演化成为一种人类寻根的历史，成为人们重新建立乡土情感的一种根基和载体，成为各地区历史建立的一个基本的要素。重庆作为古老巴蜀地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当代，都既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又在不断移民的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可以说，重庆就是一个以移民来推动建设发展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移民文化城市。重庆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移民，都直接推动了重庆城市的大规模发展。所以，严格地说，重庆既是一个以移民著称的城市，也是一个以移民来直接推动其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变化、发展的城市。

正因为如此，研究重庆移民的历史，不仅在于研究重庆这一区域的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之途，不仅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寻根之旅，更是解读我们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这株苍劲、长青参天大树的某一株根系之谜的参证，是我们固化对祖国的情感，对故乡的崇敬，对生我、养我、抚育我们的黄土地的自信、敬仰的一种史事性蕴涵。这么说是否太迂阔一些。其实不然。从古至今，人们对于自己族系的源流、根系往往有着天然的情感与崇敬。人们内在的文化与血缘基因，往往沉淀着一种对于人类本体的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到哪儿去？我们最初的血缘纽带牵缠到什么地方？漂泊千里，叶落归根。当人们从浮躁中沉静下来，当人们从年轻走向衰老，自然会开始追思这些深藏在人类血液和文化基因中的问题。从那些口口相传的历史中，从各地区的民谣中，族源的根系往往是一个古老而长青的主题，它像一颗深深埋藏于心中的家族血缘与文化种子，在遇到合适的土壤与空气、雨水，就会生根、开花，发出嫩绿的苗、嫣红的花，产生一种寻根的冲动。在中国的中部、西部、南部、东部，经久不息的流传着的人们关于根的民谣，人们关于的家的故事。像“走西口”、“闯关东”、“湖广填四川”、山西“大洪洞”等脍炙人口的传说，包括流传甚广的湖北麻城孝感移民现象，均是这种人们希望重新建立历史根底，重新恢复心灵中历史记忆的表现。据考证，湖北孝感乡在明代成化八年就不复存在，而清代移民中的“麻城孝感乡”移民本身并不多，更多的是伪籍。而现今大量的四川、重庆，包括贵州北部的居民均称自己是麻城孝感来的移民，其答案只有一个：要么是真麻城籍移民自贴标签，以便于得到认同；要么是冒籍或失去历史记忆，而渴望重新恢复这种具有寻根意义的历史记忆的人们的创造。

历史总是在二律背反中前进的。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心中的文化也在渐渐的返璞归真。而这种关于家族与根的传说，正是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揭开埋藏在人们血缘纽带之中的一把钥匙，一种载体。所以，区域性的移民历史，既是对某地区移民客观史实的重建，也是一种固化对民族、家族的情感，对故乡的崇敬，对生我、养我、抚育我们的黄土地的自信、敬仰的文化载体。

重庆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是通过移民而不断发展的地区。但是，要重新梳理它的人口流动、迁徙的历史史实，却有着诸多困难。在古代，巴（即古代重庆地区）与蜀一样，同在四川盆地之中，中原的人们常常将西南部的巴蜀，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一体的地域。

这使得我们在探索、研究重庆移民史时，常常由于历史上地域的交叉、文献中“巴蜀”的混淆等原因，而碰到移民统计与分析上的具体难题。这对于研究历史时期的重庆政区的户数与人口，不能不说是个很大障碍。由此，从文献方面区分清巴与蜀的地域与移民特点，就变得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撰写这本书时的难点。它要求我们在梳理文献时，要尽量按照如今重庆政区在历史上的地域进行整理，以求能够比较准确地探索重庆政区历史上人口流动、迁移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文献的缺失，在分析、研究中也难免有不当的地方，请读者谅解。

同时，在分析重庆移民的历史时，必须要涉及重庆乃至长江中上游的交通情况，这是重庆之所以成为一个移民城市的重要原因。在各个历史时期，长江水道及其支流对于重庆地区的移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湖广移民向四川大规模迁移的过程中，绝大部分湖广移民都是取道由湖北到重庆的长江水道即三峡流域移居巴蜀的。这样，重庆及其三峡流域地区就易于滞留大量的湖广移民。道光《夔州府志》卷34载清初“楚省饥民”每天由三峡水道入川达到数千人之众。根据三峡沿岸区县如忠州、云阳、奉节、巫山、万州、丰都等地方志记载，当时的大部分民众都是来自湖广等地的移民。这些人中，湖广、江西、福建、浙江、陕西等籍贯的人占了当地民众的大部分，土著人口却相对较少，以至于形成了“主弱客强”的局面。这样，我们可以分析在文献中“巴蜀”合称的情况下，古代重庆地区其水陆交通路线在四川盆地的东西南北人口流动中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人们经过这一地区时选择留居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种交通与人口迁移的走向是我们研究重庆移民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另外，由于历史上的移民所涉及各种社会问题较为广泛，首先它牵涉移民的政策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例如政府为了调整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而进行的非自愿性的人口迁徙等；其次还有移民的经济发展问题，例如移民居住地生存空间内的自然资源和人口比率，人口数量与生存环境中的土地的比率，人地关系是否合理的经济空间差异格局等；再次是移民中的文化融合问题，因为人们迁徙的外部条件，以及其最终迁移行为实施与否，与个人的自身主观因素，如心理因素差异、观念行为的差异有密切关系，并且由此最终引起不同的迁移行为。另外，它也包括移民中的许多社会问题，如移民家族、宗族的分分合合，以及与本

地居民的关系问题。移民中的宗族、家族情感倾向及省籍、乡籍认同感，移民群体中的关系网络，同县、同乡、同宗的县谊、乡谊、亲谊的维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延续移民家乡的宗族传统文化，包括“移民岛”现象等。因此在移民史的撰写中，如何准确把握其动态的社会发展现象，如何有机地将这些移民群体中的突出问题归纳起来，使得移民史的写作，尽可能地显得丰满和血有肉，这是在确定写作大纲，乃至文献收集中都必须要注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目前尽管有学术界前辈、同仁卓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区域移民史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思索、研究，包括开拓。因此，一部比较好的区域移民史著作，应当在写作框架的构思、理论的探讨、文献的收集等方面，尽量注意到其中的各个方面问题，力求更加全面地展现我国区域性空间中人口迁徙与流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

本书即是我和我的同仁，对于重庆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写作的一些构想。本书系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教授主持的重庆市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重庆移民史”的最终成果。由于古代巴蜀在地域空间上和文献记载上的混合性特征，加上如何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写好一部区域移民史著作，对于我们来说，尚有着许多新的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该项目的撰写大致经历了近五个春秋。最初，由我和管维良、向中银教授策划此书的编撰、进行大纲制定工作，并同我的同仁们，即对重庆与三峡历史、文化、考古有着长期研究的岳精柱、武仙竹、杨华、赵昆生、邓晓等教授、博士进行了书稿的撰写。书的初稿完成后，由管维良、向中银、岳精柱、唐春生等教授对于先秦、中古、近现代部分分别进行了审读，几位同志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最后由李禹阶进行统稿、定稿。为了将这项研究做得更加深入一些，同时也为了将体例更加统一，李禹阶在全书的统稿、定稿中，对书中部分章节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并且和作者一起，对书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

书稿撰写的分工如下：

- | | |
|-------|------------------------------|
| 绪论 | 李禹阶 |
| 第一章 | 武仙竹 |
| 第二章 | 第一节 武仙竹，第二、三节 杨华，第四、五、六节 管维良 |
| 第三、四章 | 管维良 |

- 第五章 李禹阶 汪荣
第六章 赵昆生
第七章 唐春生
第八章 喻学忠
第九章 邹登顺
第十、十一章 岳精柱
第十二章 向中银
第十三章 邓晓
第十四章 刘力 鲜于煌

本书的编撰工作得到了重庆师范大学科研处、历史与社会学院、图书馆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关心，重庆师范大学罗玲、廖小波为本书的文献注释、参考书以及出版、打印事宜，均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炳青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的编辑同志，她对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在此，谨向关心、帮助、支持和指导我们的同志们、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难免有不够成熟或者错漏之处，恳请学术界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使得本书更加完善成熟一些。

李禹阶

2012年12月于重庆师范大学

目 录

绪论 关于重庆移民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1)
第一节 移民与重庆区域移民史研究	(1)
第二节 历史文献中的“巴蜀”与当代重庆政区及交通	(18)
第三节 重庆移民史的阶段性及移民高潮	(26)
第四节 重庆移民史的特点	(36)
一 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规律和周期性	(37)
二 重庆地区的移民规模大,历次移民在全国影响广泛	(39)
三 政府的政策性移民在历次移民中占有很大比例	(41)
四 重庆地区移民大都是举族远徙,导致重庆移民的宗族观念、同乡情节较强	(43)
五 重庆峡江地区作为历代官员、士人贬黜、流寓的地方,长期以来,形成富有特色的峡江流寓文化	(46)
六 重庆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使外来移民容易与本地土著相融合	(50)
第五节 重庆移民的乡籍、族籍特征及会馆情结	(52)
第六节 移民推动着历史上重庆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56)
第一章 重庆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	(70)
第一节 重庆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特殊性	(70)
一 重庆的地理位置与地质地貌	(70)
二 生态特征	(71)
三 人类有史以来的环境变迁	(72)
四 与周围地区的环境比较	(76)

第二节	自然生态环境与资源条件	(78)
一	农业与农特产品	(79)
二	渔猎资源	(85)
三	药材与林木资源	(89)
四	盐丹资源	(91)
五	桑蚕资源	(96)
六	畜牧与果茶资源	(97)
第三节	重庆自然概况与移民的关系	(100)
一	资源环境与移民的关系	(100)
二	经济地理与移民的关系	(103)
三	交通位置与移民的关系	(105)
第二章	原始社会时期重庆的人类活动与迁徙	(108)
第一节	重庆的原始人类	(108)
一	重庆地区的早期人类	(108)
二	与中国南北区域广泛交流的重庆原始人群	(112)
第二节	重庆地区的原始人类对居住址的选择	(118)
一	重庆早期原始人类对居住址的选择	(118)
二	古代人们的住房情况	(121)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重庆的氏族部落	(122)
一	新石器时代早期重庆的氏族部落	(122)
二	新石器时代中期重庆的氏族部落	(124)
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重庆的氏族部落	(127)
第四节	文献中重庆的原始先民	(137)
一	巫山十巫据峡江	(137)
二	宝源山盐泉与巫咸国	(137)
三	由中原而来的巫载国	(139)
第五节	重庆地区远古人类与周邻地区民族文化的关系	(140)
一	东来的古移民与本地民族的结合	(140)
二	溯嘉陵江而上向川东北地区迁徙的远古居民	(142)
三	西迁到川西地区的远古居民	(144)
第六节	原始社会晚期重庆地区的人口移动	(147)

一	远古时期活动在重庆地区的巴族	(147)
二	巴族与传说中的南方三苗民族	(150)
三	关于三苗民族西迁	(155)
四	余论	(158)
第三章	夏、商、西周时期重庆的人口流动与移徙	
	(公元前 2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	(161)
第一节	巴族在三峡中兴盛与外迁	(161)
一	因盐而兴的巴族	(161)
二	巴族的外迁与扩张	(164)
第二节	巴人巴蛇部的北迁西移	(165)
一	巴人巴蛇部的形成	(165)
二	巴人巴蛇部的北移	(167)
三	巴人巴蛇部西迁	(170)
第三节	巴人白虎部的迁移	(175)
一	巴人部民东迁清江及白虎部落的形成	(175)
二	白虎巴人西迁川渝	(179)
三	巴子国的建立	(183)
第四节	其他三支巴人的西移	(186)
一	鱼鳧巴人的西迁	(186)
二	弓鱼巴人的西迁	(190)
三	鳖灵巴人的南迁	(192)
第五节	南方鬼族的西迁	(193)
一	南方鬼族的历史存在	(193)
二	鬼族的西迁	(195)
第六节	中原部民的南迁	(196)
一	中原向南边的征战	(196)
二	华夏内部的战争	(197)
三	华夏部民的南下	(198)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重庆的人口流动与迁徙	
	(公元前 770—公元前 221 年)	(201)

第一节	巴楚相争与重庆人口移动	(201)
一	楚人西进	(201)
二	“楚子灭巴”与巴人的东归	(206)
第二节	秦灭巴蜀后重庆地区的人口移动	(210)
一	秦军灭巴	(210)
二	秦楚之战	(214)
三	秦占巴地与向巴地移民	(217)
第三节	鳖灵巴人的西迁与开明王朝的建立	(218)
一	鳖灵巴人的西迁	(218)
二	开明蜀国的建立	(220)
第四节	濮人、卢人的西迁	(221)
一	濮人的西迁	(221)
二	卢人的西迁	(223)
第五章	秦汉时期重庆的移民	(224)
第一节	秦汉时的重庆政区及交通	(224)
一	秦汉时期的重庆政区	(224)
二	秦汉时期的巴蜀交通	(228)
第二节	秦灭巴蜀与巴人外迁	(234)
第三节	秦移民入巴	(236)
第四节	西汉巴地的移民活动	(246)
一	西汉前期与民休息政策与移民入巴蜀	(247)
二	武帝开边与北人入巴	(250)
三	移民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	(252)
四	巴人的外迁	(255)
五	西汉移民对巴地的影响	(256)
第五节	两汉之际巴地的移民活动	(261)
一	公孙氏集团入川	(261)
二	北方民众的迁入	(262)
第六节	东汉后期巴地的人口移动	(263)
一	三辅和中原移民入巴蜀	(263)
二	汉末巴地的外迁移民	(265)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庆移民	(269)
第一节 刘焉集团与东州人士入川	(269)
一 结构性移民——“州”成为行政区域	(269)
二 东州兵与移民主体	(273)
第二节 刘备集团及荆州人进入益州	(275)
一 刘备主政益州	(275)
二 蜀汉政权对移民的吸引	(280)
三 蜀汉灭亡之后刘氏皇族等的外迁	(283)
第三节 六郡流民进入巴蜀	(283)
一 “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	(283)
二 流民的分布和生活状况	(285)
第四节 獠人出山与永嘉南渡后的侨州郡	(288)
一 獠人生活区域	(288)
二 永嘉南渡后的侨置州郡	(289)
第五节 移民的社会影响	(290)
一 打通了重庆连接外界的交通要道	(291)
二 巴蜀“东州士”的活动加快了区域性的社会流动， 促进了不同地区群体间的融合和进步	(291)
三 巴蜀地区在稳定的国家政权统治下，经济得以 恢复和发展	(291)
四 民族融合	(292)
第七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重庆移民	(293)
第一节 隋唐五代政治与巴蜀人口概况	(293)
第二节 隋代重庆移民	(295)
一 隋时重庆政区	(296)
二 隋时重庆地区的移民	(297)
第三节 唐代的重庆移民	(299)
一 唐代重庆政区	(299)
二 唐代重庆地区的移民类型	(300)
三 唐末五代十国的重庆移民	(312)